

# “史语所”与“生命医疗史”研究

章原

**摘要：**近些年，史学界对于医疗史的研究渐趋增温，其中尤以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学者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扮演了开拓者和领军人的角色。史学界关注医疗史主要是基于寻找史学研究新路径的需要，其研究旨趣与方法也都以此为出发点，与中医界的相关研究取向有很大的差异，但对于丰富、深化传统医学史的研究，具有极大的启示与裨益，值得高度重视。

**关键词：**生命医疗史；中医；研究

中图分类号：G112；R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6281(2012)05-0013-04

一般而言，中国医学史作为中医学院专业的基础课，研究者也多具有一定的医学知识背景。其他学科的学者偶有涉及医学史的研究，但多是研究本专业时偶然涉及，如陈寅恪《〈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胡厚宣《殷人疾病考》，罗尔纲《霍乱病的传入中国》，还有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都属于此类情形。

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涉足医疗史的学者不断增多，并且研究不再是无心之举，而是有目标、有系统地逐步进行。经过这些年的耕耘，研究者群体逐渐扩大，相关的研讨会与论文、著作都已经不断涌现，俨然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研究热点。

在这其中，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学者们的成果尤其为人瞩目。他们不但最早系统地涉足医学史的研究，而且逐渐组成了以“生命医疗研究室”为核心的研究团队。团队成立以来，对于若干与医疗史相关的知识领域进行了专题研究，发表了不少很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不仅在台湾史学界引领风潮，相关研究成果在国际汉学界也居于领先地位，成为学界“生命医疗史”研究领域的中心与

重镇。

对于这样一支异军突起的医学史研究力量，史学界陆续有从历史学角度进行分析的文章。但截至目前，中医界似乎尚未有专门的文章予以介绍，仅在个别文章中偶有涉及，故撰文对于其研究情况略作介绍。

## 一、研究的缘起

“中研院”是“中央研究院”的简称，成立于1928年，是民国时期全国最高学术机构。“史语所”全称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是中研院最早成立的学术机构之一。自成立以来，史语所以其在诸多学术领域的开拓性成果而广为人知，在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目前，史语所下设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和文字学四个学门（学科），对于“生命医疗史”进行研究的发起人与核心成员多为人类学门的学者，同时，也逐渐吸引了其他学科乃至所外的人士参与其中。

那么，这些多具有史学背景的学者为何会专门涉足医疗史领域？这其中既有史学界寻求学科突破

[基金项目] 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S30301)

[作者简介] 章原，男，博士，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医药文化研究，现工作于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邮编：201203）。

与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有研究者的旨趣等偶然的因素。

先以学科背景发展而论,上世纪末的台湾史学界,有两个新的发展趋向:一个是台湾史的研究迅速兴起并成为一门显学,另一个“显著变化便是生活文化史的勃兴”<sup>[1]</sup>,医学史的研究正属于后一种研究趋势的反映。

生活文化史的兴起与此前台湾史学研究注重社会经济史的取向不同,许多学者不满于过去历史研究“大多限于政治、经济和狭义的社会,逐渐造成历史学贫乏化”<sup>[2]38</sup>,他们希望能够还历史以血肉,“使历史学成为有骨有肉、有血有情的知识”<sup>[2]1</sup>。于是,许多之前被忽视或轻视的边缘性研究反成为关注的焦点。

当时,史语所人类学学科的负责人杜正胜在反省以往史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史学”的口号,并于1991年发起创办了《新史学》学术期刊,成为这一学术研究探索的重要阵地。杜正胜认为历史是一个整体,由物质、社会、精神三个层次组成,研究的对象是人或人群,但以往的历史研究却忽视了“人”的存在。他追求“环绕着人与人群,落实真正以人或人群为对象的历史研究”,并从人的生态资源到人生的追求,拟定了十二个研究条目,其中第十一条便是“生命体认”,主要“研讨身体的认识、疾病及其处理的方法以及生命限度的突破”,已经“直接涉及过去医学史家探索的范围了”<sup>[2]38</sup>,其他“生命的追求”、“生活礼俗”等条目也与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此,关于医疗史的研究可说是“新史学”寻求历史研究新路径的一个分支,介于社会史与医疗史的交集的“生命医疗史”,试图以人群生命史来丰富社会全史的新领域。后来杜先生曾不无自得地称赞这个分支“是最令人注目的一支”<sup>[2]67</sup>。

再以国际上史学研究趋势来看,史语所学者对于生命医疗的关注也契合了西方史学发展的大方向。西方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疾病、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就已经迅速兴起,台湾学者向来与西方学界交往密切,多具有欧美的留学经历,自然感受到这种学术动向的变化。比如曾留学法国的梁其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发表了《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与《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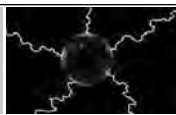
清医疗组织:长江下游地区国家和民间的医疗机构》等论文,这也使得她被认为是“中国史学界第一位真正涉足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先行者”<sup>[3]</sup>。再如林富士,他于上世纪八十年末在美国留学,对于疾病的研究一直很有兴趣,也最早向杜正胜提议进行疾病史的研究;“带头开发这个不但史语所前所未有的、也是台湾史学界不曾经营的新领域”<sup>[2]67</sup>。

从杜正胜的回忆来看,他在最初并没有医疗史的概念,进入医疗史研究还有偶然的机缘。他在1988年左右打算为度过八十大寿的老师写一篇祝寿论文,开始涉足到一些与生命、医学有关材料,这就是后来的《从眉寿到长生》一文。这篇文章的撰写用了很长时间,1995年方才发表。无疑,在写作过程中涉及的许多生命与医疗相关的知识引起了对于医疗史研究的兴趣,在1992年春天史语所第一届历史研习营上讲述“什么是新社会史”时,已经初步提出要从身体、医疗和长生等出发,把生命医疗作为建构社会史的新内容。

杜正胜当时是史语所人类学组的执行人,学术资历与威望都很高。在他的影响和建议下,几位年轻的研究者纷纷将研究转向了医疗史。核心研究成员中,林富士曾计划作汉代疾病的研究,但当时主要研究的是汉魏六朝的巫。其他人从未涉及医疗史,也不具有医学背景,李建民的博士论文本来是研究自杀、死亡的主题,在杜正胜的建议下,改成了研究生命。另一位核心成员李贞德当时正在华盛顿大学留学,研究汉魏六朝妇女的婚姻和法律,在杜正胜的建议下,加上了生命医疗内容<sup>[2]67-68</sup>。

史语所正式涉足医疗史研究的标志性事件是1992年7月成立了“疾病、医疗与文化”研讨小组。研讨小组开始参加的人并不多,李建民回忆中提到这段时期的参加者主要就是林富士、王道还、李贞德与李建民四人<sup>[4]154</sup>。李贞德后来回忆:“每个月总有某个星期六的下午,几位年轻同仁在前辈师长的带领下,一起研读古典医籍,企图实践史语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的传统,为历史研究寻得新天新地。”<sup>[5]</sup>

1995年到1997年,“疾病、医疗与文化”研讨小组与部分研究宗教、礼俗的学者们结合,成立了“生活礼俗史研究室”,除了常规的资料整理、讨论



会之外,在1997年6月召开了“医疗与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1997年7月,以原来的“疾病、医疗与文化”研讨小组为基础成立了“生命医疗史研究室”,从“生活礼俗史研究室”分离出来,成为正式的研究群体,一直延续至今。“生命医疗史研究室”的成立有着明确的宗旨和目标,即结合不同学科、不同单位的学者,以“生命与医疗”为核心课题,共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以增进学界对于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人类社会的整体认识。

就这样,史语所关于医疗史的研究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起来,并成为今天国际汉学界“生命医疗”研究的重镇。

## 二、研究的旨趣与方法

虽然研究对象同样是医学史,但史语所的学者从一开始的研究主题就与医学界完全不同,这自然与他们的学术背景有关。因为他们全部是人文学者,又完全没有医学背景,这也使得研究旨趣偏于社会文化层面,正如杜正胜所言:“我们的兴趣是要研究历史上的社会和文化,不敢说是科学的医疗知识。”<sup>[21]69</sup>

其实,从史语所学者二十年来研究主题的选取上,就可以大体看出他们研究的旨趣与方法所在。

在最初几年“疾病、医疗与文化”研讨小组的摸索之后,1995年,杜正胜在三年来讨论小组成员的具体成果的基础上,将未来研究的方向划分为五条:1、对于身体的认识及赋予的文化意义;2、医家的族群和学术归类;3、男女夫妇与幼幼老老的家庭史;4、从医学看文化交流问题;5、疾病医疗所反映的大众心态。<sup>[2]</sup>

“生命医疗史研究室”成立之后,发挥团队研究的合作优势,以史语所的学者为中心,召集学界相关研究人员,先后推动和施行了多个整合性研究主题。

第一个是1997年提出的“中国历史上的医疗与社会”的三年期整合型研究计划(1998-2000);第二个是2001年提出的为期三年(2002-2004)的研究计划,主题为“宗教与医疗”;第三个研究计划是以“影像与医疗的历史”为主题,进行为期三年(2009-2011)的研究,主要运用图像、影片等视觉史料,从观看经验及其影响入手,探讨近四百年来

的医疗史发展。目前,“生命医疗史研究室”正在着手进行的是“医疗的物质文化”研究,主要是从物质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医学史。

一般而言,这些主题研究多以2-3年为限,而且多是采取“双轨制”的方法进行,即在一个主课题之下,有若干相关的子课题。一方面,子课题的负责人独立负责子课题的研究;另一方面,各子课题负责人又定期讨论或聚会,交流对于主课题的研究。事实证明,这是一种比较灵活、有效的研究路径,可以充分地整合各方面的学术资源。

在研究的过程中,“生命医疗史”研究室的研究者并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十分注意学术的交流与互动,在各个研究主题进行期间,都不断举行相关的主题研讨会。如进行“中国历史上的医疗与社会”的研究期间,就召开了5次研讨会,主题分别为:中国十九世纪医疗(1998年5月22日);洁净的历史(1998年6月11-12日);养生、医疗与宗教(1998年1月9日);健与美的历史(1999年6月11-12日);疾病的历史(2000年6月16-18日)。又如在进行“宗教与医疗”的主题研究时,先后召开了4次学术研讨会:巫者的形象(2003年8月22日);占卜与医疗(2003年8月29日);基督教与传教医学在中国(2003年11月26日);宗教与医疗(2004年11月16至19日)。

通过这些主题研究及相关研讨会的不断举行,史语所在生命医疗史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陆续发表了不少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不少研究者都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专著或主编专题论文集。他们的研究也得到了海内外学界的高度认可,2003年,汇聚了亚洲各国研究医学史学者的“亚洲医学史学会”将秘书处设在了这里。

与此同时,“生命医疗史研究室”的研究队伍也在日益壮大,除了史语所的基本成员之外,一般成员(包括史语所以及中研院其他研究所以及院外学者)达到50余人,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随着时间的发展,他们的人员组成、学术组合也更加合理,目前已经有不少专攻医疗史的学者加入其中,他们研究的领域也从开始的偏于中古时期,一直延伸到了现当代。

新近出版的《生命医疗史系列书目》丛书可说

是史语所医学史研究的集中展示,这套丛书目前包括六本,分别是李贞德主编的《性别、身体与医疗》、李建民主编的《从医疗看中国史》、李尚仁主编的《帝国与现代医学》、林富士主编的《宗教与医疗》和《疾病的历史》。丛书收集了各个主题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论文,主编均为“生命医疗史研究室”的核心成员,也都在医疗史研究的大方向之下,各有所长:李贞德为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博士,她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从性别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的医疗文化;林富士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博士,他的研究领域主要以宗教医疗等相关联;李建民为台湾大学历史学博士,致力于中国古典医学的重建与反思;李尚仁为伦敦帝国大学科学史科技史与医学史中心博士,主要研究十九世纪的医学与生命科学。

从“生命医疗史”推动的研究计划与研究者的个人的研究专长领域中可以看出,他们所受的学术训练多具史学背景,研究旨趣也主要是从历史学、社会学角度出发,注重的是医疗行为与社会、与文化之间的广泛联系。

### 三、结语

近代以来,学术分科日益精细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学科之间彻底断绝关系。换一种视角,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往往能走出一番新天地,别具一番魅力,史语所生命医疗史的研究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对于有学者称传统医学史研究为“内史”,而史学界所从事的是“外史”,大都介于社会史和医疗史之间,并未深入中国医学的核心地带,即中医学术理论和学科发展等的观点<sup>[4]</sup><sup>34-35</sup>,他们也并不认同。杜正胜认为他们的研究固然不是“内史”,但也不等于“外史”,而是“另类(alternative)医疗史”,主要借医史课题或从医史资料来认识社会面貌,把握文化的特质,其重点自然是在一般的历史研究而不同于专业医学史的范围<sup>[2]</sup><sup>55</sup>。

其实,不论是“外史”,还是“另类医疗史”,均着眼于历史研究与专业医史的不同之处,但似乎忽视了二者基于共同的研究对象,其共通之处其实更多。所谓内史研究与外史研究,也只是“意在强调

各有侧重”,实际上,在医学史的研究中,“内史研究与外史研究是紧密相连,不能截然分开,也绝不能有所偏废”<sup>[6]</sup>。“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尽管有着不同的研究旨趣与方法,但二者的研究均具有积极的互补意义。

传统医学研究将关注的重点集中在医家、医学著作中,着重于分析医学知识与理论的内在流变,对于医学思想的发展有明晰的梳理。这固是其长处,但也有不足之处,因为医疗始终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并不只是医学思想的发展,不止关系到人体的生理与疾病,而且与社会生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在医学与社会文化的互动方面,恰是历史学者研究专长。他们选取的材料,并不限于医书,而是史书、笔记、小说、文物等皆为我所用,他们的视角,也不限于医学一隅,这就决定了其视野的开阔与丰富,也更能构筑起医学发展的立体面貌。医界的研究者倘能认识到这一点,并吸取其长处,将医学史的发展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去研究,相信一定能取得更为“有血有肉”的成果。

反之亦然,历史学者倘要真正深入医学史的研究,也终究绕不开一定医学知识的积累与掌握;史学工作者来说,这方面的补课是必不可少的。除了现代医学知识的学习外,还更有必要认真研读传统医籍,这些医籍所蕴藏的社会文化讯息可能很多是其他文献所不具备的<sup>[7]</sup>,否则就只能在医学的外围打转,而无法深入医学史的核心,其对于与医疗相关的社会、文化的理解也多少会受到一定的制约与影响。

### 参考文献:

- [1] 王晴佳.台湾史学50年[M].台北:麦田出版,2002:11.
- [2] 杜正胜.从眉寿到长生[M].台北:三民书局,2005:38.
- [3] 杨念群,黄兴涛,毛丹.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710.
- [4] 李建民.方术医学历史[M].台北:南天出版,2000:154.
- [5] 李贞德.性别、身体与医疗[M].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8:1.
- [6] 朱建平.开拓我国医学史研究的新视野[J].中华医史杂志,2005,35(1):3-6.
- [7] 余新忠.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3):94-98.

(本文编辑:李海英)